

晏阳初平民教育救国思想在定县的实践

吕晓青, 艾虹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在寻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晏阳初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思想。他认为必须通过对平民教育来实现自由平等,提倡除文盲、作新民,并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实验,以“四大教育”来解决农民的识字问题、生计问题和卫生问题,相对改变了当地农村的落后状况,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尽管定县平教运动存在着一些问题,并因抗日形势的紧张而被迫中止,但却是晏阳初等志士教育救国梦的伟大实践,开启了中国平民教育改革的先河,为国内外平民教育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宝贵经验。

关键词:晏阳初;定县;平民教育;宣传;自由平等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5-0125-06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君主专制的清王朝被中华民国所取代。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取,民主共和仅成为一纸空谈,北洋军阀的昏暗统治再次给广大民众带来了深痛灾难。军阀混战、自然灾害和西方资本的掠夺,使得广大农民承受着沉重的负担。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到救国运动中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和自由而奔走呼号。晏阳初便是这一群体中为平民教育和民族复兴而奋斗终生的教育家和爱国者。20世纪20年代,随着晏阳初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实践的丰富,他逐渐产生了教育救国思想,积极宣传并付诸实践,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今河北定州)进行了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将自己的教育救国梦予以践行,进而为之奋斗终生。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和公民教育问题的重视,晏阳初及定县平民教育运动不断受到学界重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予以研究,但多侧重于对平民教育运动的过程性阐释,或对运动的影响进行述评^①,鲜有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晏阳初的教育救国思想。本文试从晏阳初的教育救国思想和理论发展入手,着重探讨其在定县平民教育过程中的实践,重新审视定县平民教育运动这一历史问题,以

收稿日期:2015-03-12

作者简介:吕晓青(1991-),女,河北冀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专门史。

^①学界关于定县平教会的研究较多,有关平教会内容及价值的研究包括:范荫棠的《民国时期的定县平民教育》,《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李金铮:《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试验》,《二十一世纪》(香港),2004年10月号;田成刚:《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述论——以定县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郝宏桂:《晏阳初“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启示》,《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梁俊:《民国时期平教会的乡村建设活动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6月;杨茂庆:《民国时期留学生与乡村教育试验》,《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冯杰:《晏阳初为定县乡村建设四次赴美募捐考略》,《史学月刊》,2009年7月等。关于平教会在定县的推行过程的有宣朝庆:《地方精英与农村社会重建——定县试验中的士绅与平教会冲突》,《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4期。

期加深对晏阳初等爱国志士的精神世界与爱国实践的了解,丰富对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研究。

一、晏阳初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生

晏阳初,四川巴中人,1893年出生在书香之家,自幼便受其父美堂先生“讲求实学”思想的影响。1913年,20岁的晏阳初进入香港大学就读,后赴美留学,先后获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和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成为较早系统接受英美先进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晏阳初讲求实学的品质、系统的知识体系和对民众疾苦的关注,促成了他勇于探索、敢于实践的性格,并热衷于为改善底层人民生活而努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一方对外宣战,并派出华工赴英法战场做苦力。因绝大部分华工不识字,远在欧洲战场的贫苦劳工难以同家人取得联系,为帮助这些远在异乡的同胞,一些留学生作为志愿者前往欧洲,帮助工人代写家书和进行翻译,晏阳初便是其中之一。

在帮助华工写信、翻译的过程中,晏阳初决定“授之以渔”,尝试着利用华工休息的时间教他们识字。广大工友热情很高,由于思乡心切,求学的欲望很强,进步很快。这一情况使得晏阳初甚为惊讶。因长期以来,读书识字对普通民众来说一直是奢侈的事情,往往要倾尽家族之力来供养一个读书人。近代以后,随着中国逐渐被迫融入世界体系,农村经济破产,人民生活日益困苦,广大农民的教育程度更为低下,这使得中国文盲数量众多。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每百人中便有80人之多,而相比之下“英国每百人中只有3人,在法国只有4人,在美国只有6人,在日本也只有4人”^{[1]38}。

华工进步之快,使得晏阳初为之振奋,对比国内教育水平之低,晏阳初日渐认识到:“中国诚朴农民智慧高、能力强,只可惜缺乏读书求知的机会;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竟是这样愚昧无知,完全不认识自己多数同胞的‘苦’与‘力’。”^{[2]28}

在海外从事教育实践的晏阳初,亲眼所见目不识丁的华工受洋人歧视,认识到教育的缺失是导致国人落后的重要原因,开始思考通过提高平民教育水平来改变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这促使晏阳初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价值。1923年,晏阳初明确提出,“要实现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谋”^{[3]9}。

这表明,此时他已将平民教育工作作为自己的至高责任。之后,随着他对平民教育工作的展开,又有了更为明确的表述:“自由平等必须要建筑在人民的教育程度上。漫说国际上不以自由平等待我们,即使国际上以平等自由待我们,我们的处境就能够保证比今天更富强么?因为成千成万的民众,还不曾受过最基本的识字教育,所以不自由平等的缘故,是在我而不在他人。”^{[3]184}他认为“要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最有效力的方法,莫若‘教育’”^{[4]7}。

对华工和平民进行识字教育的过程,使得晏阳初注意到普及平民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推广平民教育来挽救中国,成为了他的一项重要思想。在此影响之下,晏阳初不断深入到推广平民教育的活动中去。以“四大教育”为主要内容和以“三大方式”为主要途径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和完善起来的。

二、平民教育理论的宣传与初步实践

晏阳初于1920年归国,先后于华中、华北、华东等人文环境不同的地方宣传其平民教育思想,并逐步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他带领一部分爱国之士以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和上街游行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主张,呼吁倡导全国性的识字运动。

在宣传中,晏阳初多次强调平教会的根本宗旨是“除文盲,作新民”。他强调,“如愿中国上流,那惟一着手的办法,就是把这许多目不识丁的男女同胞,设法上流起来”^{[3]31},而这一办法“非各省教育家一面拼命提倡,一面下死功夫去研究平民教育不可”^{[3]31}。

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影响,晏阳初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案:

(1)全城遍贴画张数千份,如“对症发药”、“举国皆瞎”等描摹不识字的苦及教育的急要,以醒眉目。

(2)省政府告示几百张,同图画并贴城中,劝告家庭有不识字的子女的,和店铺有不识字的学徒,均来校读书。

(3)本城各中学及中学以上的学生同军乐队,分段发送二万六千余份劝学传单。

(4)分段召集店主大会,先给他们看看影戏娱乐娱乐,然后对他们演讲“工人教育的需要”,希望得他们的赞同,送学徒来校读书。

(5)召集全城各界大会一次,由省长主席。

(6)各中学及中学以上的学生,到各街道分队演讲,一面演说教育的紧要,一面报告新运动的办法。

(7)全城举行游街大会一次(由各校学生组成),人人手持旗帜或灯笼,上面写着“不识字是瞎子”、“你的学徒是瞎子吗?”、“忍看同胞都眼瞎么?”、“救中国的根本方法,是平民教育”等警句。^{[3]38}

这些宣传方案虽然有些超出了晏阳初等人的组织范围,但多颇具触动性和可操作性,往往用热闹、直观的方式来引起人们关注,对于宣传其平民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反复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和提倡在全国开展识字运动外,晏阳初等人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实施方案予以推行,如主张编写适用于平民教育的教材,从常用的数千字中选取最通用的一千字作为“基础字”,编成三册,称为“平民千字课读本”,分成122课来教授。在编写教材和进行宣传的过程中,晏阳初还十分难得地注意到了如何调动平民的学习热情,特意强调所编选的文字、内容要适用于平民的生产和生活,即要具有实用性。

随着平民教育主张影响的扩大,晏阳初在张伯苓、朱其慧和陶行知等人的帮助下,于1923年8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并任总干事。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调查和组织筹备工作,平教会所提倡的平民教育开始转入了局部实验阶段。在平教会领导下,平民教育倡导者在华北、华东和华南等地区开展了义务扫盲活动,并开始注意到将主要精力由城市转向农村,于1924年9月在平教会添设乡村教育部,深入到保定道所辖各县进行识字教育宣传,并在定县、清苑、博野等县的乡村进行平民教育状况调查工作。

晏阳初归国后的一系列宣传、组织和筹备工作,使其平民教育救国主张得到了迅速传播,尤其是平教会的成立和20年代中期的初步尝试工作,为之后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全面实验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平民教育救国思想在定县的全面实践

平教会在全国各地推行的平民教育试验,反响强烈。随着平民教育实践的开展,晏阳初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讲平民教育,须知平民教育,即是贫民教育”^{[3]34}。

中国是农业大国,城市化并不发达,农民占据绝大多数,且生活贫困,大多数文盲在乡村而不在城市,因此要实现平民教育,要从农民教育开始。晏阳初指出:“中国是一个没有城市化,但却有1835个基本单位县的国家……在四亿人民中85%以上的人生活在这些县的乡村中,因此,改造中国必须将县作为关键单位。”^{[3]184}在晏阳初走访调查之后,决定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试验,1926年平教会在定县设立办事处,晏阳初举家迁往定县,全力投入到实践平民教育救国思想的活动中。

定县位于河北省西部,保定与石家庄之间,交通较为便利。自清末以来便有一定的教育基础。光绪二十八年,定县知县和当地士绅便提倡兴办学堂,光绪三十年,定县翟城村米春明先生创办初等小学堂,是为全县首倡。此后,定县各地开始推广教育,毁庙兴学,一时间,定县教育有了大的进展,为在定

县推行教育改革打下了重要基础。

李景汉通过对定县的社会调查认为:“定县人民颇注重教育,农家皆尽其力所能及,使子弟入学读书,故识字人数,大约比较其他邻县为高,大多数的村庄都有学校。”^[9]据他在1928年对定县62村人口的文盲数调查可知,定县的文盲状况大致如表1所示。

表1 11~50岁之1752人口中文盲与非文盲数目之比较

教育程度	男子		女子		男女共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数目	百分比/%
绝对文盲	560	51.2	619	94.1	1179	67.4
半文盲	71	6.5	3	0.5	74	4.2
非文盲	463	42.3	36	5.4	499	28.4
总合	1094	100.0	658	100.0	1752	100.0

注:资料来源于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第233页。

定县的绝对文盲数量占67.4%,与之前晏阳初在美国世界教育会议上所提到的中国文盲普遍状况(每百人中有80人是文盲^①)相比,文盲所占比重明显较低,这说明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更易于推行。

同时,之所以选择定县作为实验基地是因为有一位热心教育的乡绅——米迪刚。与中国的其他地区一样,其农村推行的都是“乡村共和国”的体制,乡村中主要事务由村中的长老决定。自民国建立以后,曾有一部分具有进步思想的官员在农村推行改革,但这些改革并没有深入人心,且其时间较短,给农村带来了负面影响。因而,在不了解平教会的前提下,长老们反对平教会进行改革,对此晏阳初回忆时说:“他们中有些人了解我们的计划,但大多数人不了解,他们认为我们可能是一帮传道士。他们甚至怀疑我们是想收集他们村的内部情报,心想也许政府会加重他们的税务。以前的官员千方百计地压榨他们,他们不敢相信这一群人,仅仅是为了研究当地情况而毫无私心。”^{[3]144-145}不仅乡绅们有如此反应,当地的农民也对平教会产生了质疑。人们普遍怀疑:“平教会利用模范县招牌之机动,向来对平教运动之领袖不表信任……晏先活星(应为“晏先生”)四川人,为什么不在他那故乡去作好事?”^[6]而米迪刚曾留学于日本,思想开放,能够更深入理解平教会的理念,他在平教会与当地乡绅和农民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沟通作用,为平教会在定县的开展减少了重重阻力。

晏阳初在定县推行平民运动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农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的现状,同时也意识到了在农民中推行教育改革的困难,经过实地调查,反复思考,平教会制定了一系列合乎农民生活方式的举措,即“四大教育,三大方式”。

四大教育是“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文艺教育主要针对的是农村中普遍存在的文盲现象,教育农民识字读书,其主要目的在于教会农民运用文字于生产实践当中。同时针对农民具体生活特点通过秧歌、歌谣、戏曲等文艺形式,使文艺教育深入人心;生计教育是针对当时农村经济破产而言的,主要注重农村的经济建设。时人对此多加重视,晏阳初提到“农村经济问题中最严重的,莫如土地问题”^{[3]567},农民之所以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根源在于贫穷,因而生计教育是根本。在推行生计教育的过程中,将文化教育与科学技术相结合,注重培育优良的品种以增产、惠农;卫生教育是针对中国国民体弱多病的特征而开展的,中国人在当时有“东亚病夫”之称,而体质弱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卫生意识。有鉴于此,平教会在定县开展卫生教育,教农民进行科学的防疫、助产等卫生保健知识,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培养农民的卫生意识;公民教育是鉴于当时中国人自私的特性而发起的,其主要目的在于训练中国人的团结意识,注重公民训练和自治教育。

三大方式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学校式以青年为主,注重基本知识和方法的传授;社会式和家庭式主要针对成人,注重道德的培养和习惯能力的训练。儿童和青少年更容易接受新知识和方法,而成人因工作家庭等原因,不能完全保证学习时间,社会式和家庭式的教育更适合于成人。

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所开展的生计教育引进了美国的科学技术,改良了当地农作物和动物品种,

^①参见:晏阳初《晏阳初教育论著选》,第38页。晏阳初所提到的每百人中有80人是文盲时值1923年,李景汉的调查在1928年,即使中间经历了5年,因为没有对农民系统地进行扫盲教育,所以变化不会太大。

提高了单位产值,从整体上推动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通过三大方式的教育,提高了农民的文化素质和识字能力;此外,平教会在定县推行的卫生教育也使得当地的卫生状况有了显著改变,预防了很多疾病,提高了农民的身体素质。

晏阳初的教育救国梦萌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并很快得到发展和完善,明确演变成了平民教育救国思想,最终在定县得以全面实施。整体而言,定县平民教育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最终却因抗日局势的紧张和一些不良影响于1937年被迫中止。

四、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终止原因及历史意义

在定县进行平民教育实践的十年间,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救国运动的伟大实践期,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留下了不少遗憾。自1926年平教会前往定县,晏阳初等人一直奋战在乡村平民教育的第一线,“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使得定县面貌发生了重要改观,在国内外赢得了强烈反响。然而,由于抗日形势的不断紧张,平教会在定县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于1937年被迫中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再也未能在国内找到下一个“定县”而予以实施,此后,他怀着对广大贫民的深切同情,将其后半生投身于国际乡村建设工作中去。

晏阳初所领导的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平民教育在乡村的全面实践,在当时引发了广泛影响。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然而,由于它未能彻底触动土地制度,加之操之过急,未能取得政府的全面支持,因此其并未达到为定县广大农民谋取永久福祉的目的。同时,由于此次平民教育运动是晏阳初为开启民智、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自由平等的一次试验,而其结果却犹如昙花一现,自始至终也未能使定县之外的1834个县推行“定县模式”。因此,从这一点来讲,这场轰动一时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工作,是失败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未能协调好各方面利益,缺乏革命性。定县平民教育是一种自发的组织,平教会自进入定县开展活动之初,便因其行为损坏了乡绅的利益,而遭到当地乡绅的排斥。如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到:“平教会无形中在定县执行了一个大革命,那些原来得势而现在失势的人,自然不满意平教会。”^[6]“凡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工作,未必有利于本有特殊权益的少数人,这少数人因了精神上或物质上的损失,难免有意无意做了农村工作的障碍”^[7]。由此可知,在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一直都伴随着重重阻挠。由于平教会并不具备彻底发动群众进行革命的勇气,难以从根本上变革农村土地制度,正如李景汉所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若不在土地私有制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8]这最终决定其难以从根本上完成教育改革。

第二,缺乏政府的支持。1926—1937年,北洋军阀覆灭,国民政府集中力量对城市进行再建设,但对乡村建设的关注程度不大,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平民教育是自发的教育救国组织,并未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以经费为例,其经费的主要来源需要自己筹办,晏阳初曾提到,经费的途径来自“热心平民教育的个人;演戏或开音乐会,或游艺大会;各公共机关如商会教育会工会等捐助”^{[3]39}等等。此外,晏阳初还经常赴美募捐,如他在1929年3月4日《致A.B.库克夫人》的信中谈到:“为补助我们的研究费和训练预算,事关北平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的实质性工作,所以我们请求美国基金会和个人每年能捐助敝会50万美元,即维持敝会5年的活动经费,以度过中国财政困难期。”^{[3]80-90}经费的不固定,无疑是平教会开展教育运动最大的障碍。因此抗战一爆发,教育运动便无法实施下去。

第三,工作急于求成,忽视了客观实际。当时有很多人反映他们太求速效,太重宣传,不肯埋头苦干。平教会所建立的设施多半是为应付参观而用的,对于实际的社会改良无益,人民无法感受到改良的好处,取得的成绩并不显著。他们贪图虚荣,将原有的成绩冒充自己的成绩,如当地的乡绅谈到“三十四年前定县即有了笨重的水车,十年前又有了轻便水车,所以有句旱不死的定县歌。至于定县教育,

向来就很发达的,并非平教会到定县之后才如此的成就”^[6]。平教会组织的同学会成员良莠不齐,一部分为无业流氓,所以在受过教育后更加骄傲放纵,以至于“同学会干涉村正,争夺权力,恶劣分子乘机肆虐,鱼肉乡里”^[9]。甚至还有人认为平教会产生了宗教冲突。这些情况对于当地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使农民对平教会日趋怀疑,阻碍了教育改革的根本实施。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定县的平民教育工作,是近代以来新式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爱国图强运动。尤其是晏阳初等人对教育功用的大力宣传和努力实践,使得教育救国这一出路受到了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同时,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是一场真抓实干的教育改良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教育的不平等,更是为后世的教育改良和国际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定县平民教育实验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救国思想的一次伟大尝试,开启了中国平民教育改革的先河。它是在对定县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民主科学的理念,对当地农民进行的一次包括知识、道德和生活全面的教育改造。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被迫中止,未能在全国推广开来,但在定县地区取得了较大成果,是晏阳初等平民教育家共同努力的果实,为后人改造乡村,推行农村教育,提升国民的总体素质和推广国际乡村建设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激励了并将继续激励着爱国志士投身于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去。

参考文献:

- [1]马秋帆,熊明安.晏阳初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2]吴相著.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M].长沙:岳麓书社,2001.
- [3]宋恩荣.晏阳初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4]晏阳初.农村运动的使命[M].北京: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1935.
- [5]李景汉.定县须知[J].农民,1931(33):8.
- [6]王土先.对定县平教会的多角度批评[J].深光,1933(9-10):16.
- [7]孙伏园.谈谈定县的农村工作[J].文化建设,1937(4):76
- [8]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下)[J].社会科学,1936(3).
- [9]李明镜.平教会与定县(通信)[J].独立评论,1933(79):17.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of Yan Yangchu's Education Saving the Dream

Lv Xiaoqing, Ai Hong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bstract: During exploring the way of saving the nation, Yan Yangchu grew up the idea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He thought it was important that achieving the freedom and equality by the education for the masses, and advocated to wipe out the illiteracy, and made them become the literate. In addition, he carried out the experiment in the Dingxian County, and used “the four Education” to solve the peasants’ problems including the learning to read, livelihood and health, which changed the backwardness of the country in a certain extent and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at home and abroad. The civilian education of Dingxian County existed some problems, and was halted because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but it was the great practice to Yan Yangchu’s dream of saving the nation by education, which was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civilian education reform, and providing the experience for the civilian education career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Yan Yangchu; Dingxian County; civilian education; propaganda; freedom and equality

(责任编辑 张春生)